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再探

——以《〔万历〕福州府志》为例

林光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探究方志小说作品相关情况,可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材料上的有力支撑。其中,《〔万历〕福州府志》较有代表性。该方志载约62则小说作品,见于《舆地志》《祀典志》《人文志》《杂事志》4志,分布上呈现出分散性及集中性。这些小说作品大部分来自文人笔记,按照地域性、真实性、教化性的标准进行择取和删改。从方志本身出发,方志小说作品在史学、文学与地域文化3个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方志小说作品;《〔万历〕福州府志》;地域性;教化性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23)05-0071-09

前辈学人多将方志作为资料来源,从中挖掘部分小说史料来服务于某一专题研究,如小说家生平考辨、小说概念考辨、小说目录编纂等,因此,有学者提出,“系统整理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对扩大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空间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1]。诚如所言,丰富的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方志门类多样,取材广泛,如何从纷繁的记载中快速找到这些材料?探究方志小说史料的收录规律,并进一步探讨其择取标准,可方便学人按图索骥,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程毅中认为小说作品为小说史料核心^[2]。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先从微观角度入手,择取某部代表性方志,探讨其中小说作品的相关情况见微知著,进而扩大研究视角,以期在方志小说研究领域建立起全景式、多层次、立体化的史料支持体系,为界定、评价古代小说提供翔实材料,也为后续小说研究、文献研究或地域文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万历〕福州府志》(以下简称“《府志》”)在具体类目设置上基本贴合明朝颁布的《修志凡例》,内容多为学者称道,主要修纂者谢肇淛创作有文言笔记,同时也是小说批评家,择取其作为研究方志小说作品的样本符合学理。

本研究试以《府志》为例,对方志小说作品的分布、特点与择取标准等问题做相对深入的分析。另需说明的是,方志修纂者的小说观多承班固,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有所不同,本研究立足于当今视角,所指方志小说作品包含2类:(1)具有故事情节、虚构特征的故事。(2)野史杂谈。具体包括仙人故事、鬼怪故事、人物逸事等。一些没有故事情节的简单片段及文章中的故事,暂不列入考察范围。

一、分散与集中:明清方志小说作品的分布规律

方志内容宏富,分门别类记载一地之疆域、沿革、山川、气候、建置、乡里、物产、祠庙、财赋、军事、风俗、人物、艺文、异闻等,涉及门类多样,并按从古至今的顺序剪裁,形成一部时空交错的地方百科。可惜的是,方志并未专设“小说”一门收录此类史料,因而如何在浩繁的方志文献中有规律地披沙拣金,以便学人按图索骥,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府志》由明代喻政主修,林烜、谢肇淛纂,共76卷,以纲目体行文。全书分10志,依

〔收稿日期〕2023-0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8ZDA258)

〔作者简介〕林光钊(1995—),男,福建三明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次为《輿地志》《建置志》《祀典志》《兵戎志》《食货志》《官政志》《选举志》《人文志》《艺文志》《杂事志》，总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俗等各方面，分目完善，资料翔实。笔者对其统计，得小说作品共约62则。这些小说作品载于《輿地志》《祀典志》《人文志》《杂事志》4志，一半以上作品收录于《杂事志》，可见方志小说作品的分布呈现出分散性及集中性特征。

这种分布的分散性及集中性在具体二级类目中表现更为明显。《輿地志》等4志下设多个二级子目，并不是每个二级子目都有小说作品，而是集中分布在某些子目中。具体来说，《輿地志》分“沿革”“分野”“疆域”“山川(上)”“山川(下)”“水利”“土风”“节序”等目，而小说作品集中载于“山川”2目；《祀典志》分“文庙”“名宦祠”“乡贤祠”“坛壝”“祠庙(上)”“祠庙(中)”“祠庙(下)”7目，小说作品集中载于“祠庙(上)”“祠庙(下)”；《人文志》分“理学”“名臣”“忠节”“风概”“清操”“前修”“循良”“校友”“儒林”“文苑”“隐逸”“乡行”“方技”“迁寓”“仙释”“奸佞”“列女”17目，其中小说作品载于“循良”“隐逸”“仙释”“列女”；《杂事志》分“古迹”“古墓”“寺观”“时事”“杂谈”5目，小说作品集中载于“杂谈”。

方志小说作品为何会呈现此种分布情况？有必要对方志小说作品各志的收录情况做一整体了解。

(一)《輿地志》

《輿地志》以行政区划为分野，记述一地地理状况，涉及政区沿革、山川风貌等自然地理及楼台庙宇等人文地理，集中反映当地人文印记。该目10则小说作品分别为：《榴花洞》《蟾溪》《盘谷》《朱顶山》《偃草山》《破石》《降虎峰》《高盖山》《螺女祠》《鼃溪》^①，皆为山川传说，如《蟾溪》言白马三郎于溪斩杀一恶蟾，后人为纪念之，便将此地名为“蟾溪”，白马三郎也成为当地守护神灵之一。

(二)《祀典志》

《祀典志》记载一地祠庙，祭祀对象包括国家正祀、民间祠神、名宦、乡贤等，反映儒家礼制主导下的国家祀典体系在这一地区具体历史风貌。该目10则小说作品皆为当地祠庙神灵故事，分别为《灵沟庙》《马仙庙》《刚显庙》《昭利庙》《显灵庙》《灵应庙》《顺懿庙》《显应庙》《金吾祖庙》《龟岭庙》。如《顺懿庙》故事：

在县东三十里临水洞。神姓陈，闽江南下渡陈昌女也，嫁刘杞，卒年二十四。临水洞产巨蛇，时吐气为疫厉。一日，有朱衣人执剑索白蛇斩之，乡人诘其姓名，曰：“我江南下渡陈昌女也。”忽不见。亟往下渡询之，乃知其为神，遂立庙于洞。宋淳祐间，赐额“顺懿”，封慈济夫人。有祈辄应。元末重修，邑人学士张以宁为之记^②〔3〕215。

“顺懿夫人”信仰在闽台地区尤为兴盛，其传奇故事广泛流播于信仰之地，就方志所载“显圣斩白蛇”来看，民间还流传着与白蛇同归于尽的版本，可见其传说之多变。

(三)《人文志》

《人文志》主为当地乡贤立传，兼收名宦、流寓，并按照人物主要成就或特点入《理学》《忠节》《儒林》《文苑》等小目，为一地风流人物荟萃之处。该目8则小说作品分别为：《陆引》《萨琅》《徐登》《董奉》《义收》《大智禅师》《僧铨》《何宗实妻陈氏》。这些传主有着独特人生经历，加之民间流播，从而变得愈发神奇。如，《陆引》言陆引为官造福象山百姓，死后变为城隍；《萨琅》言萨琅至孝，母亲绝而复苏。这些传记具有明显的神奇色彩，虽不是有意虚构，但亦可视为小说作品。

(四)《杂事志》

《杂事志》为方志最后一目，多为寺庙、古墓、丛谈等，内容多样，故称为“杂”，章学诚认为这些材料多为“征材之所余”“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4〕}534。该目34则小说作品全为“委巷稗史”，如《忠犬护主》《化蛇敲鼓》《闽中无雪》《茂七叛乱》等等，皆为街谈巷议

① 本文所有方志小说作品题目，皆为笔者自加，主要以作品前几字或概括内容为题。

② 本文材料多引自《〔万历〕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整理版，某些标点不从原文，恕不一一注明。

之事。

综合来看,《府志》所载小说作品可粗分为山川传说、神怪故事、奇人异事、街谈巷议等,皆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而这恰与方志某些类目所具有的实录性相抵牾。《建置志》《兵戎志》《食货志》《官政志》《选举志》皆为真实反映某地情况,同样具有实录性质的“分野”“疆域”“水利”等二级类目在叙述时也多秉承信笔,通常不会收录这类虚构性质的小说作品。《食货志·物产》,虽然在介绍物产时会引用诗文来提高趣味性,但不会引用相关传说故事辅助说明。《艺文志》只记载与本邑有关诗文、书目等文献,小说作品不在收录之列。因此,这6目及一些二级类目没有小说作品分布^①。

《杂事志·杂谈》为方志小说集中厕身之处,这与方志的修纂传统有关。方志修纂目的之一为“有裨风教”：“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4]751}当地野史逸闻，虽为小道，但却从侧面反映一地社会风貌，周朝时期官方就已经组织人手深入民间采风：“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5]这样的采风传统使得街谈巷议成为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府志·杂事志一》即言：“至于灾祥变故之迹，委巷稗史之篇，采风者所不废也。”^{[6]696}因而，历代修志者都注重收集广泛流传于当地的逸闻轶事，将其加工改制，供统治者察民情、兴教化。颇值一提的是，清代中后期以戴震、章学诚为首的方志学家对方志艺文的收录展开论辩，但都未主张剔除这些小说作品，可见他们对于此类史料入方志的肯定。

“类聚”是书籍重要的编纂方法之一，方志即以“区分类聚”作为重要的编纂思维，不过方志家在对地方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有些材料难以归类，于是需要另立一个类目处理这些“无类可附”的材料，“杂记”因以诞生^[7]。方志体例大约定型于宋代，现存的宋代方志约有30余种，大部分都立有“杂记”

“杂谈”“杂录”等目收录野史丛谈，明清两代亦沿袭这一体例，如以简核著称的韩邦靖《朝邑县志》，全志仅为7篇，也立有“杂记”收录当地逸闻轶事。具体就《府志》而言，亦承袭之，其为妥善处理此类逸闻轶事，《杂事志》专设“杂谈”一目收录“稗官野语”，故此成为小说作品荟萃蚁合之处。

方志小说作品分布于记载一地山川、祠庙、人物（特别是释、道人物）等目，尤其集中于“杂谈”，分布上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的分布为小说虚构性与方志实录性之间矛盾及《艺文志》收录文献传统所致；而小说作品集中在《杂谈》一目，实因采风入志及编纂体例的影响所致。

二、地域、真实、教化：明清方志小说史料收录的三重标准

“因袭旧志”是方志主要成书方式，其所载小说作品亦具有承袭性，《舆地志》《祀典志》《人文志》中的小说作品多见于前志。《杂事志·杂谈》所载小说作品也对前志有所承袭，但与上述3志不同的是，《杂谈》所载多非方志编纂者所作，以抄自他人笔记居多，其择取标准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地域性

方志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事实为职能的一种著作。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地记，目的在于“矜其乡贤，美其邦族”；隋唐的图经，其编纂是为了更好地上报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等情况；从宋代起，方志的发展趋于定型，内容虽然不断丰富，但无论是府、州、县志，还是乡镇志、边关志以及山水、寺观等各种专志，都具有明显的区域范围^{[8]9}。“不越地而书”是方志内容的主要特征，这种鲜明的地域性同时也是《杂谈》最重要的择取标准。《府志》所载34则小说作品，或主角为福州人士，如《马森督漕》主人公马森，福州怀安人，官至户部尚书；或主角为福州官员，如《化蛇敲鼓》言蔡襄知福州事；或故事发生地域在福州，

① 必须说明的是，某些方志《官政志》也会载录小说作品，但数量较少。如《〔正德〕福州府志》关于虞愿、陆引的传记，带有神异色彩，亦可属于小说作品。

如《先辈风致》发生于福州府,言名儒龙仁夫过福州府受宴请事,均不出福州地域。

(二) 真实性

关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看法,主要有地理书说、史书说、亦史亦地说、综合书说、资料书说、政书说等^{[9]285-292}。仓修良一说较有代表性:“它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其性质实际上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不过史的性质更强,总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8]3}但无论方志是史、地,或间于史地及上述其他的任一种著作,都表明方志应当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杂谈》所载小说作品也多具有真实性。试以《海鰪大如牛船》为例:

万历丁未四月内,有海鰪大如牛船,入江至洪塘金山塔湖,暴鬣数日,众以为怪,莫敢取,经五七日。人见其由磨心塔出海澳,有三汉港阁浅,复入峡内,至今未出,不知潜在何处,未经月,水涨五次^{[6]756}。

该则故事出于《府志》编纂者之一谢肇淛所著《麈余》,为记“露脊鲸”于洪塘金山塔湖暴鬣数日事。谢氏自谓《麈余》取材:“宾友过从,下榻相对;时征僻事,各记新闻。不能言者,强之说鬼。退则稍为删润,上之侧厘,久乃成帙,命曰‘麈余’……是帙也,耳目近事,岁月有稽,征且信矣。”^[10]说明该书材料来于宾友来访所言,且为“耳目近事,岁月有稽”的“征且信”之事,王枝忠对照《麈余》所收故事,言谢氏所言符合实际,认为这些故事出自作者亲身见闻与宾朋耳闻目睹^[11]。此外,谢肇淛父谢汝韶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月,“海鰪入福州”事发生于万历丁未四月,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此时谢肇淛丁忧归家。综合来看,此事可信度较高。

(三) 教化性

前文已述,方志“丛谈”“杂谈”的设立主要为收录那些为采风者所不废的委巷稗史之篇,究其原因,不外乎供统治者察民情、兴教化。《杂谈》所收录小说作品多来自文人笔记,这类

小说作品如《汉书·艺文志》所言:“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12]具有“史之流别”的文体性质,“资考证、广见闻、寓劝诫、供谈啁”的功能价值定位,“据见闻实录”的记述姿态和写作原则,题材类型也多历史人物逸闻琐事^[13],颇有可资参政之作,选入方志的,恰也是此类作品居多。如取自《南村辍耕录》之《清风堂尸迹》,显示出小说作品“寓劝诫”的教化特点:

福州郑丞相府清风堂石阶上有卧尸迹,天阴雨时迹犹显。盖其当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几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辅之坊”。郑显时侵渔百姓,至夺其屋庐以广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杀于此。今所居为官势豪夺,子孙不绝如线^{[6]752}。

福州郑丞相府为南宋参知政事郑性之的府邸,府中“清风堂”石阶依稀可见一卧尸痕迹,且“天阴雨时,迹尤显”。郑性之(1172—1254)初名自诚,字信之,一字行之,号毅斋,南宋嘉定元年(1208)戊辰科状元。性之受业自朱熹,理学颇有造诣,但在明代福州民间百姓口中人品却不佳,传言其致仕归乡后侵夺百姓财产以广其私宅,以致“有被逼抑者,遂自杀于此”,此迹乃“冤抑之志不得伸”的表现。王应山《闽都记》更将郑氏刻画为睚眦必报的形象,言性之因家贫受到肉店老板侮辱,后高中状元还乡杀之:“性之令缚至庭,数其罪,捶杀之。”^[14]可见郑氏负面形象多有流传。《府志》有郑氏传,俨然一爱国为民之能吏:“治郡所至,务崇教化,厚风俗。民有骨肉争讼者,辄晓谕敦切,不严而治。在上左右,每劝上虚已纳谏。”^{[6]478}郑性之在《人文志》与《杂谈》中的形象对立,显示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其“今所居为官势豪夺,子孙不绝如线”的结局则颇有劝诫切勿鱼肉乡里之意味^①。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异颇大,各地有其特色。古代盛行“异地为官”制度,地方郡守多来自外地,为熟悉一地民情,不少官员下车即索求方志以知疆域

① 关于郑性之此行径,清代杨庆琛于其《绛雪山房诗钞·榕城古迹杂咏》认为子虚乌有。今人王离京也认为郑性之非睚眦必报的小人,参见其著《大宋状元》,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237-238页。

之宽狭、山川之险易、土壤之肥瘠、物产之美恶、民庶之多寡等知识，如清代江苏武进县知县杨宜仑“下车即访求简册”。因此，方志唯有具备地域性及真实性，才能准确反映地方特色和地方优势，以便于施政参考，即所谓“志之系于政而达之于政”，而这也是文人笔记入方志最基础的两则标准。除此之外，方志所具有的教化性也影响《杂谈》对文人笔记的择取。方志可以进行封建道德教育，对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大有帮助，而这正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因此，选入方志的文人笔记也就多具有教化性。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这些选自文人笔记的小说作品是否与原来相同。通过比对，笔者发现有一部分会原封不动著录，但更多的故事会被删改，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笔者归结为“三删一改”：（1）删除与本地无关的故事。如取自《鹤林玉露》的《中兴赋联》，《府志》所载与原版相比，少了方翥解试“中兴日月可冀赋”的故事：“其年第五人方翥，兴化人，解试‘中兴日月可冀赋’。一联云：‘伫观僚属，复光司隶之仪；忍死须臾，咸泣山东之泪。’亦经御览，亲笔录记。”^[15]（2）删除一些虚构情节。如选自《寓圃杂记》的《邵宏誉失机》，《府志》未交代邵氏姓名，也未交代邵氏结局，《寓圃杂记》叙述较详，记载邵氏字宏誉，终亡：“后邵见曹，不能避，其头已断矣。”^[16]（3）删除评论性文字。如源自《南村辍耕录》的《先辈风致》，故事主人公龙仁夫（1253—1335），字观复，号麟洲，江西庐陵永新人，为有元一代名儒、教育家、诗人，时人尊为“龙夫子”，《元史·儒学》有传。时路经福建，宪使设宴款待，席间请龙仁夫为妓玉带赋诗。龙仁夫负海内重名，又不能违宪使之请，遂书一绝云：“菡萏池边风满衣，木樨庭下雨霏霏。老夫记得坡仙语，病体难禁玉带围。”于是举席称叹，尽欢而散^{[6]752}。《南村辍耕录》于此诗后还附有议论性文字，夸赞龙仁夫风致：“盖前辈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时风致可想见，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17]但此段《府志》未载。（4）删改对本地循吏的负面记载。如录自《夷坚志》的“黄子方”，母本故事中还有对黄裳的负面描写：“时方兴道藏，郡守黄冕

仲尚书裳使十二县，持疏敛之民，琮独不应命。既闻他县皆数百万，乃自诣郡，以已俸四月输之。冕仲虽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诘。”^[18]

文人笔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删改情况，实质上还是为了贴合择取标准。上述例子中，方翥为兴化人，与福州无关，其故事自然不会选入《府志》；《邵宏誉失机》对邵氏结局的记载具有浓厚虚构成分，也与“真实性”不符；《先辈风致》缺载部分乃为议论，带有主观倾向，亦与“真实性”相矛盾；黄裳为福州循吏，于政和年间任闽地郡守，于当地多有惠政，福州各《府志》也有意营造其循吏形象，若全文著录上述故事则有损其形象，不利于教化百姓。由此也可看出，方志的纂修者始终站在维护统治的立场，就算与“真实性”相抵牾，也要确保其有利于教化。

综上，方志对文人笔记的择取，以地域性、真实性、教化性为主要标准，而对于那些收录作品，也需要进行一定删改以贴合这3个标准，究其原因，其目的是维护官方统治。

三、史学、文学与地域：明清方志小说史料的价值梳理

前人将方志的价值概括为“资政、存史、教化”，方志小说作品亦如此，但方志小说作品的价值绝不限于此。有学者从小说本位出发，指出有补小说目录收录之不足、补小说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之不足、将方志文献与小说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提升小说研究的水平等作用^[19]。若从方志本位论述，笔者认为方志小说作品的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深挖与细化，有鉴于此，笔者将之分为史学、文学与地域3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梳理。

（一）史之流别

《四库全书》对图书的分类基本可以代表我国古代对书籍性质的看法，方志隶属于史部，立足于此，方志中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不可忽略。具体而言，《府志》编纂者的小说观远承班固，将这些逸闻轶事归为野语丛谈，认为其亦有可观：“昔宋洪迈采遗事，著随笔，寿皇清闲之燕阅而喜之，谓其议论有裨，是丛谈也，窃

亦附于营蒯之逸诗而观省者,或庶几于随笔之后云尔。”^{[6]756}这些看似奇幻、具有荒诞色彩的故事实为史之流别,具有补史之用,试举一例如下:

成化年间,长乐县突发瘟疫,民众病死甚众,《〔正德〕福州府志·祥异志》简叙经过,未言瘟疫的发生原因:“(成化)十六年,长乐县十八都昆由里地平突起小阜,高三四尺,践之辄陷。明年复于其左涌起一山,广袤五丈余。是年大疫,傍近居民病死甚众,向聚观者悉罹其祸。”^[20]林嫌主修《〔万历〕福州府志》亦载此事,内容不出《〔正德〕福州府志》所载,且更为简略:“(成化)十六年,长乐县十八都昆由里突起小阜,高三四尺,践之辄陷。明年,复于其左涌起一山,广袤五丈余。是年大疫,民多死。”^[21]此事《府志》亦有载,与上述两志所述有所不同:

成化十三年,福建长乐县平地起一山,度之,高二丈余,横广八尺。山旁一池,忽生大蚬,民取食之,味甚美,乃争取食,不数日,患痢死者千余人^{[6]755}。

此条取自陆容《菽园杂记》,与《〔正德〕福州府志》所载相比,有三处不同:(1)在时间上,改“成化十六年”为“成化十三年”,并将事件的持续时间由两年变为一年。(2)在小山的规格上,改“高三四尺”“广袤五丈余”的两座山为“高二丈余,横广八尺”一座山。(3)在瘟疫原因上,指出源于“患痢”。

暂不论二者矛盾之处何者为真,就《杂谈》将瘟疫原因归为“食蚬患痢”,为正史及《〔正德〕福州府志》未载,颇值考量。《菽园杂记》作者陆容对历代笔记中虚构捏造名人轶事、历史传闻的现象多有批判:“凡小说记载,多朝贵名公之事,大抵皆好事者得之传闻,未必皆实。”^[22]可见《菽园杂记》的创作乃是秉持“诗兼美刺,寓劝惩”的先王遗教,力求做到不溢美、不掩饰而审慎择笔,时人王鏊对此高度评价:“本朝纪事家,当以陆文量《菽园杂记》为第一。”^[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云:“是编乃其札录之文,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24]当代学者吴道良也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他对一些地区的民生民情、民俗民习和工农业生产情况做了大量翔实的记录,从而

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具体而生动的社会生活史资料。”^[25]因此《菽园杂记》所载可资参考。就长乐县而言,方志《物产》载当地盛产蚬、蛤等贝类,这类食物若是处理不当,食之容易造成肠道感染引发痢疾,在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患此疾病造成人员死亡是常态。综合两者来看,《府志》所载长乐成化瘟疫源于“患痢”是可信的。另外,这则故事最终也取代另外明朝两部府志对该事件的记载,为后世《长乐县志》所继承。这也可见方志对于小说作品存在着追问真相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比部分史著更为丰赡,能补正史之阙。

(二) 文学趣味与保存文献

方志小说作品有两点文学价值值得重视,其一是小说作品为方志增添不少“趣味性”与“文学意趣”。《〔同治〕续修永定县志·纪闻》载录方志小说作品,并非源于传统的“教化性”,而是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保存故老传闻:“邑居湖湘边境,当时怪异,竟有出于张华、干宝、酈道元、洪容斋所纪载,虽事本非经,而文实足赏,乃窃窃效其体,附记一二,以存故老传闻之旧焉。”^[26]换言之,文学的修辞技巧与表现力渗透进方志的叙述非限于高雅的诗词文章,山川传说、神怪故事、奇人异事、街谈巷议同样具有文学趣味,“事本非经”的方志小说作品同样具有观赏性。若从传播的角度观照,这些流传于底层民间的轶闻传说,较之阳春白雪的诗文更加通俗而有趣,也更容易吸引读者。如载于《府志·輿地志·山川(上)》的《榴花洞》:

东山去城十里而近有寺。有洞曰“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蓝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门,始极窄,忽豁然,有鸡犬人家。主翁谓之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与亲旧诀,乃来。”因与榴花一枝,而山恍若梦中,旦日复往,遂迷所在^{[3]30}。

该故事初见于《方輿胜览》,《〔淳熙〕三山志》载之,历代福州府志遂袭之。榴花洞故事在文字表述上有浓厚的模仿痕迹,“始极窄,忽豁然,有鸡犬人家”“吾避秦人也”“旦日复往,遂迷所在”等,这些皆与《桃花源记》描述雷同,但这不妨碍该故事在福州的流传。据史

料记载，蔡襄知福州时特意找寻此洞，并留下《榴花洞》一诗赋之：“洞里花开无定期，落红曾见逐泉飞。仙人应向青山口，管却春风不与归。”^[27]自此榴花洞名声大振，吸引李纲、黄裳等人为此地赋诗，榴花洞随即成为福州著名景观，笔记、长篇小说也开始出现“榴花洞”形象。“榴花洞”从现实风景到多种文体的纸上风景，足见该故事的趣味性与传播力。

其二是方志小说作品具有保存文献之功。方志不同于人文诗集，其编纂不在于著述，而在于编辑、剪裁，是经过众多人员长期搜集资料，在丰富材料基础上编成的^{[9]282}，因此方志有许多材料源于他处。经统计，《府志》方志小说作品约30条辑录自它书，如《舆地志》的《螺女祠》叙述出自《搜神记》，《人文志》之《陆引》见《〔嘉靖〕宁波府志》，《杂事志》则多直接录自《夷坚志》及其他文人笔记。这些被征引的书目某些已散佚，如《杂事志·杂谈》所载《浦舍人源》：

浦舍人源，无锡人，初至闽时，往见林子羽。子羽不出，使二玄（周玄、黄玄）问所从来。浦舍人乃书《送人之荆门》一诗投之，曰：“以此相评耳！”二玄读至“云边路远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大喜曰：“此吾家诗也。”遂以白子羽，子羽始出，相见甚欢，因留连久之，多所唱和。浦舍人之诗名于是大噪^{[6]753}。

此则材料出自刘钦谟《岳台集》。《皇明词林人物考》载有刘钦谟小传：“刘榘园公昌，字钦谟，吴县人，生而颖敏，读书过目辄诵，工属文，十九举乡试第一，明年会试第二，人廷试高等。”^[28]笔者查检各大网络古籍数据库，均未见《岳台集》存世，或许今已失传，《府志》著录此则材料，有保存文献之功。

（三）地域观照

彰显地域特殊性是方志职能之一，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方志的重要体现，如《〔嘉庆〕重修台湾县志》凡例云：“史之所重者在时事，志之所重者在地产。史以时事别异同于古今，志以地产别异同于方隅也。”^[29]因此，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以方志为中心探讨一地人文情况，如何李、陈林钰即以《〔道光〕厦门志》提炼其中所蕴含的闽南人文与城市记忆元素^[30]。方志中的山川传

说、神怪故事、奇人异事、街谈巷议，皆有具体的地域限制，虽然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但以文化学、民俗学等视角览之，便能体会到这些小说作品其实是地域文化的观照，为读者描绘一幅“国风”图。如《福州仪门外夹植榕树》：

福州仪门外夹植榕树，每树有白鹭数十巢其上，鸣噪往来，狼籍污秽。薛直老弼为守，尝乘舆出，粪污其衣，心欲伐树，未形诸言。是夕，安抚参议官曾悟梦介胄者恳云：“某受命护府治，所部数百人皆栖榕树间，今府主欲伐树，吾无所归矣。愿为一言。”既寤，不闻有伐树议，明夜复梦，曰：“乞亟言之，不然，无及也。府主所恶，不过鹭秽，此甚易事，请期三天，悉屏之。”明日，寤以告，薛讶曰：“吾欲伐树，言未出口，而神先知，可敬也。”至暮大雨，三日乃止，鹭群悉空，濯濯如新^{[6]750}。

福州知府薛弼因寓于榕树上的白鹭“鸣噪往来，狼籍污秽”而欲伐树，但还未脱口，白鹭立马托梦安抚参议官曾悟请求勿伐，最终薛弼感于“言未出口，而神先知”中断伐榕念头，白鹭也于三日内飞离榕树，情节奇异，颇具趣味。以地域视角观之，便可发现该故事其实是福州“榕城”自白。三山遍植榕树，唐末即有“榕城”雅称，感于富有特色的榕城风貌，历代福州文人留下不少吟咏相关诗词，一些福州文人也将个人著作冠以“榕”字，福州城内不少建筑也以“榕”名。薛弼最终等待白鹭搬迁，也未伐树，正象征着榕树与福州百姓和谐相处，确有反映当地风土文化的价值。当然，因方志有“一地百科全书”的美誉，小说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经济、政治、教育等多方面情况，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结 语

方志小说作品因其虚构性，主要分布在方志记载一地山川、祠庙、人物、杂事等目，又因采风传统的影响，方志特辟“杂谈”（或其他实同名不同的类目）一目收录街谈巷议，使得此处成为小说作品槐聚之处。这些小说作品大部分来自文人笔记，按照地域性、真实性、教化性的标准来择取和删改，追根溯源，与维护官方统治直

接相关,是地理空间与官方偏好的重要反映。经过相关学者的探讨,方志小说史料的价值逐渐被挖掘,若从方志本身出发,方志小说作品在史学、文学与地域文化3个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借由此篇,笔者想再谈一点。方志与生俱来的地域性、史学性与文学性是地域文学研究的有力注脚,但当今学界以此为基础展开地域文学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文学不是由一篇篇独立的作品组成,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念与其紧密相关,方志恰好是一方古今总览,若打破学科壁垒,以方志文学史料为研究基础,并结合已有的地域文学研究方法,以全局视角研究之,是否能更加客观呈现一地文学生态,从而进一步推进当前地域文学研究?这正是笔者所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杨志平.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 [N]. 光明日报, 2019-09-02 (13).
- [2] 程毅中. 古代小说史料漫话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1.
- [3] 喻政修, 林烜, 谢肇淛, 纂.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 万历福州府志: 上 [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 [4] 章学诚, 撰, 叶瑛, 校注. 文史通义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5] 魏征. 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012.
- [6] 喻政修, 林烜, 谢肇淛, 纂.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 万历福州府志: 下 [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 [7] 曾繁靖. 古代方志设立“杂记”的传统及其门类功能与价值 [J]. 中国地方志. 2022 (1): 54-61.
- [8] 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9] 黄苇, 巴兆祥, 孙平, 等. 方志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 [10] 谢肇淛. 麇余. 续修四库全书丛书: 第1130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60.
- [11] 王枝忠. 谢肇淛, 文言小说《麇余》简介 [J]. 明清小说研究, 2001 (3): 205-212.
- [12]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45.
- [13] 谭帆.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88.
- [14] 王应山, 撰, 林家钟, 刘大治, 校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 闽都记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44.
- [15] 罗大经, 撰, 刘友智, 校注. 鹤林玉露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392-393.
- [16] 王锜, 撰, 李剑雄, 校点. 寓圃杂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5.
- [17] 陶宗仪, 著, 武克忠, 尹贵友, 校点. 南村辍耕录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297.
- [18] 洪迈, 著, 李昌宪, 整理. 夷坚志. [M] // 全宋笔记: 第九编·三.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8. 72-73.
- [19] 伍光辉.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方志文献 [J]. 华中学术, 2017 (3): 89-97.
- [20]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 正德福州府志: 下 [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422.
- [21] 林嫌. 万历福州府志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314.
- [22]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菽园杂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0.
- [23] 侯忠义. 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499.
- [24] 永瑢, 纪昀, 主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 727.
- [25] 吴道良. 陆容《菽园杂记》的史料价值 [J]. 南都学坛, 2003 (3): 31-33.
- [26] 万修廉, 龙恩湛. 同治续修永定县志 [Z]. 清同治八年 (1869) 刻本.
- [27] 陈庆元, 欧明俊, 陈貽庭, 校注. 蔡襄全集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203.
- [28] 王兆云. 皇明词林人物考 [Z]. 明万历刻本.
- [29] 谢金鑒. 嘉庆续修台湾县志 [M] // 台湾文献从刊: 第140种.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2: 11.
- [30] 何李, 陈林钰. 道光《厦门志》中的闽南人文与城市记忆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6 (1): 84-92.

A Restud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ovels in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king Wanli Fuzhou Local Chronicles as an Example

LIN Guangzh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related situ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novels can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literature. Among them, *Wanli Fuzhou Local Chronicles* is a typical one. In *Wanli Fuzhou Local Chronicles*, there are about 62 novels, which are found in the chronicles of *Yudizhi*, *Sidianzhi*, *Renwenzhi* and *Zashizhi*. Most of these novels come from literary notes, which are selected and edite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region, authenticity and morality. Local chronicles novels have unique values i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ocal chronicles novels; *Wanli Fuzhou Local Chronicles*; region; morality

(责任编辑 张永汀)

(上接第 58 页)

Predict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Policy Based on PCA-GRNN

SUN Qi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fin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China at presen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principle of generalized 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 (GRNN) to establish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model to achieve future prediction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the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t is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al energy structure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carbon emissions continue to rise from year 2024 to 2028, and the growth rate in 2028 will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the carbon peak target will be achieved ahead of 2030, and the clean energy will replace coal. In the face of this phenomenon, our country should track the “double carbon” goal and establish a green finance system,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lean energy and further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nov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vector green financing to assis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society, China’s financ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firstly,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top – level design of green finance and establish a practical incentive mechanism; secondly, expand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strengthen regulation of the carbon finance market; thirdly, build a green supply chain financial ecosystem.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PCA; GRNN; financing policy

(责任编辑 陈蒙腰)